



北京大学哲学系系友回忆录

苦乐年华

王宗昱 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苦乐年华

王宗昱 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苦乐年华/王宗昱编.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4

(北大哲学系系庆丛书)

ISBN 7-301-07150-7

I. 苦… II. 王… III. 北京大学—校友—回忆录 IV. G649.2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27838 号

书 名: 苦乐年华

著作责任者: 王宗昱 编

责任编辑: 谭 艳

标准书号: ISBN 7-301-07150-7/B·0277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

网 址: <http://cbs.pku.edu.cn> 电子信箱: zpup@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025

排 版 者: 北京军峰公司

印 刷 者: 河北三河新世纪印刷厂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mm × 980mm 16 开本 26.5 印张 450 千字

2004 年 4 月第 1 版 200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6.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序 言

春天，我们又相聚在未名湖。或许你蓦然发现燕园变了，不见了你曾钟爱的丁香、西府海棠，少了那漫山遍野的二月兰，但是你仍然喜爱燕园的春天。在你心里，北大永远是春天。

北大的春天是生机勃勃的，因为每个学子都把生命的春天献给了北大。千万个年轻的生命汇成了中国的新世纪的原动力。这是摧枯拉朽的力量，是革故鼎新的力量。一百年来，北大的学子一直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先锋。北大人用青春热血染红了二十世纪的日历。

1

北大的春天是自由的：乱花浅草间孕育了数不清的种子，长随新叶长新枝。燕园是北京植物种类最多的校园。北大人的思想就像燕园的草木，万紫千红，汇成了春天的绚烂。

北大的春天也是稚嫩的。这里也有癫狂柳絮、轻薄桃花。我们也曾摧折了智慧，湮没了仁心。北大的土地厚德载物，为我们承受了耻辱。

燕园的春花象征着光明，每一次归来我们都复习着真理。未名湖的春水象征着纯洁，每一次归来我们都净化了灵魂。

北大的春天是我们的青春汇成的，北大的春天也给了我们生命。本书中的故事已经是历史，但是当我们相聚时它们还是那样鲜活，因为那里面有我们的对白、我们的笑靥、我们的泪水。那是我们曾经上演的春天的童话。

目 录

序言 /1

回想北大当年 张申府/1

北大忆旧记 冯友兰/8

值得感念的岁月 梁漱溟/12

纪念北大 50 周年并为林宰平先生祝嘏 熊十力/16

要原汁原味地介绍外来文化 汪子嵩/21

忆从汤先生学习西方哲学史 张岂之/31

在北大四院学哲学的日子 牛萌生/37

北大生活回忆 黄怀安/39

从沙滩到燕园 宋文坚/47

我与自然辩证法 孙小礼/60

怀念著名美学家马采先生 侯鸿勋/68

忆我在北京大学的学习生活 且大有/74

冯友兰教授“牛棚生活”二三事 郭兰芳/79

忆 50 年代北大的合唱活动 池超波/91

忆旧拾零 黄耀枢/95

51 级旧闻 朱德生/104

纪念院系调整学生合并 50 周年 汪国训/107

50 年代哲学生涯忆事 程静宇/111

元帅与士兵 朱德生/116

燕园, 我的人生起点与归宿 傅世侠/119

- 说不尽的感谢 刘纲纪/125
- 忆新中国成立后以苏联专家指导为主的 53 级研究生 朱传荣/132
- 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当学生的难忘岁月 林可济/137
- 往事犹可追 张翼星/150
- 记哲学系的自然科学基础课 王育才/155
- 燕园读书 任吉悌/158
- 从一篇毕业论文想到的 羊华荣/160
- “为了自己弄清问题”的代价 杜镇远/162
- 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的创立及其艰难历程 王永江/168
- 鲁山人民公社调查追记 陈闻桐/177
- 北大劳动生活回忆 李浙生/182
- 往事点滴 张文儒/184
- 深刻的启示 永生的遗憾 韩敬/192
- 黄村“教育革命”始末记 罗匡/200
- 我心中的冯定 章玉钧/210
- 回忆在芦城的生活片断 徐荣庆/221
- 北大杂忆 牟钟鉴/224
- 难忘的岁月 杨家祚/232
- 教我怎样做人 何炳济/242
- 我的同学和我的老师 默明哲/249
- 忆朱光潜先生 丁枫/258
- 北大萦怀 张世珊/265
- 北大入党往事的片段回忆 王永祥/267
- 魂牵梦绕忆燕园 郭志鹏/272
- 20 世纪 60 年代北京大学雷锋活动的点滴回顾 翟荣凯/282
- 负笈北大 赵庆麟/285
- 哲学彻底击中了我的心灵 仓道来/294
- 母校难忘 师恩难言 季秀青/305

西江月·见校庆邀请函	张连富/307
百感交集忆在北大哲学系上学的6年	宋定国/308
“文革”与苦闷	陈炳坤/318
性格决定命运	曹祖明/321
我在北大哲学系的3年	曹永善/326
友谊地久天长	赵伯宁/337
哲学的贫困	张兆满/341
74级学习生活漫忆	张东岭/344
跟贺麟先生学《小逻辑》终身得益	李继馨/352
斗室三年胜千年	舒扬/355
忆恩师王太庆先生	李晨阳/361
历历在目 永铭心中	陶济/365
尊严学术	王治河/373
高瞻远瞩 春风化雨	周北海 邓生庆/378
哲学地生活着	胡海涛/383
记忆的位置	杨立华/388
梦魂萦绕哲学楼	黄正泉/391
那西门前的高大身影	林哲元/396
我记忆中的北大哲学系	赵建林/398
小忆靳希平老师	周佳梅/403
问学记	程林/405
北大有感	程林/408
学而不厌 海人不倦	李宏伟/409
魂牵梦萦的北大	鲁力军/413
编后记	/417
出版后记	/418

回想北大当年*

张申府

我从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到毕业后留校教书,前后共八个年头。想起北大当年,使我兴奋,令人回味。

进北大

北京大学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它是戊戌变法运动的产物,是维新派克服了顽固守旧势力的重重阻挠建立起来的高等学府。辛亥革命后,严复被任命为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后京师大学堂改称北京大学校,大学堂总监督改称大学校校长,各科的监督改称学长,原来附属的高等学堂亦改称为大学预科了。

1913年,我在北京高等师范学堂附属中学班读书。秋天,跳班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当时的北大设文、法、理、工科和预科,本科设在地安门的马神庙,预科设在北河沿的清代译学馆旧址。

所谓“预科”相当于北大的附属高中,学制为三年(后改两年),毕业后可以免试升入本科。预科又分为两类:第一类预科毕业后升入文、法本科;第二类预科毕业后升入理、工科,它偏重于数学的教学。

我在第二类预科上了一年,觉得并不大吃力,便想去考本科,可是北大的理工科有严格的规定:凡报考本科者,必须有高等专门学校毕业的文凭。初期读文科的人并不太多,因此报考文科只要求同等学历,并不注重文凭。我升学心切,暑假改了一个名字,考上了文科。

北大文科分哲学、历史、国文学、英文学四个学门(后改称为系),我上了哲学门。照北大原定的计划,哲学门分为中国哲学、西洋哲学、印度哲学三类,但这个计划并未实现,只是混合设立一个哲学门。我虽然入了哲学门,却一心不忘数学。那时,我见知于数学系主任兼代理学长冯祖荀先生,

* 原载作者文集《所忆》。

在哲学门不到两个月,又转入了数学门。

可是转了数学门,我又放不下哲学。在哲学门两个月的学习中,时间虽然极短,但眼界大开,我对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样,我上的是数学的课,读的却多是哲学的书。从那时起,我主要研究的都是哲学及其有关科目。当然,数学书始终不断在我的涉猎之中,只是数学题从不肯做,化学实验更是绝少动手。

藏书楼

我刚进北大时,学校还没有图书馆,只有一个藏书楼,设在马神庙校舍后院的所谓四公主梳妆楼里。藏书楼的书可以外借,但没有阅览室。过了一年,藏书楼腾出一些地方,辟出阅览室,阅览桌放在中间,四周摆上书柜,柜里都是西文书。平时总是上着锁,线装书则放在楼上,借阅的人也并不多。我上预科的时候,常常从北河沿到藏书楼来借书,犹记得那时我借的书有德文与法文的数理科学百科全书等。一个大学预科一年级的学生,借读这样高深的德法文书,当时并不很多。这得到了冯祖荀先生的青睐,藏书楼的管理人员由此也给了我许多方便。上本科后,我更是经常呆在阅览室里。那时书本来无多,我可以就架恣意快读,除了工程书以外,柜里的书几乎没有我不看的。

有一天,我发现了一本装潢精美的书,是一个精装本,1914年美国出版,书名是《我们的外界知识》,英国罗素著。翻看一遍,觉得很有意思,又坐下来接连看了两遍,真有点爱不释手了。由此我发现了罗素,并对之产生了兴趣。30年代,我一度再任北大讲师,专讲罗素哲学,这也可以说是与北大藏书楼的帮助分不开的。

蔡元培主校

1917年初,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在蔡先生的主持下,学校厉行改革,出现了新的气象。

蔡先生是浙江人,1868年生,清光绪十八年(1892年),为壬辰科翰林,时年24岁。蔡先生早年很有才名,他见清王朝已不能持久,为适应时代的潮流,便从事哲学、伦理学等新学的研究。他到过日本,加入了孙中山组织的同盟会,积极从事民主革命活动,后来又 to 德国学习。辛亥革命后,蔡先生

曾任南京临时政府首任教育总长和北京政府教育总长，后因遭到袁世凯的仇视，被迫再赴欧洲。袁垮台后，蔡回国出任了北大校长。他虽是一个资产阶级学者，又是科举出身，但他对破旧创新有锐利的勇气和坚强的毅力。

蔡先生实行“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旧学旧人不废，而新学新人大兴。他聘请陈独秀任文科学长（即文学院院长），章行严（士钊）、刘半农、钱玄同、周作人、陶孟和等任教授，后又聘任马寅初、陈豹隐等。同时，蔡元培还裁减了不称职的教员，排除了一批腐败守旧的人物。经过这番整顿，教师队伍的素质大大提高，给学校带来了蓬勃的朝气。在蔡元培“兼容并包”的口号下，当时在校的教员既有宣讲马克思主义的李大钊，也有拥护袁世凯做皇帝的筹安会人物刘师培，另外还有前清大学士李鸿藻的儿子李石曾教生物学，年仅二十三岁的梁漱溟先生讲印度哲学等。

蔡先生大力提倡思想自由，培养学术研究的风气，这是他进行改革的又一个重要方面。北京大学过去是一座封建思想、官僚习气十分浓厚的学府，不少学生以上大学为晋升的阶梯，对研究学问没有兴趣，上学不读书，而是想方设法混资历，找靠山，还有的人打麻将、逛八大胡同。与我同宿舍的几个学生，就很少读书，而是聚在一起打牌。

面对这种局面，蔡先生从提倡思想自由出发，举办学术讲座，组织学术团体，例如新闻研究会、哲学研究会等。蔡元培亲任新闻研究会会长，以“研究新闻理论，增长新闻经验，谋求新闻事业之发展”为宗旨，邀请李大钊和著名的新闻界人士邵飘萍等到会讲演。同时，一些进步的政治团体也纷纷成立，像少年中国学会、新潮社等。这两个团体分别编辑出版了《少年中国》月刊和《新潮》。我亦参加了这两个团体的活动，并为之撰写了一些短小文章。

蔡先生还发起组织了一个进德会，以不嫖、不赌、不纳妾为基本戒条，针对北大一部分学生的恶习，用这样的方法培养个人高尚的道德情操。这个组织的出现，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对旧社会上层道德堕落、生活腐朽的强烈不满。当时进德会在校内颇有影响，入会的人很多，对于北大部分知识分子个人道德的提高产生了较好的影响。

蔡先生在学术上，是以治美学而闻名的。他刚到北大不久，我送他一大本新出版的讲述法国19世纪美学家居友（J. M. Cugau, 1854 - 1888）学说的日文书，他很快就看完了还给我。他组织了“画法研究社”、“音乐研究会”等一些课外文化艺术活动来培养学生对美育的兴趣，以贯彻其“以美育代宗教”的主张。

在蔡元培校长的革新精神指导下，北京大学气象一新，在全国教育界、学术界以及思想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成为五四爱国运动的中心。

李大钊和红楼

1917 年底，李大钊经章士钊之荐到北京大学任图书馆主任。

自从蔡元培主校后，北大藏书楼改为图书馆。1918 年夏，沙滩的红楼建成，图书馆也搬了过去，占了新楼的第一层楼。李大钊的主任室就设在红楼东南角上的两间房子里。一时红楼成了新思想运动的中心，许多进步的教员、学生聚集在这里读书、座谈。

我认识大钊还是在 1916 年他到北京后不久。我的一位同学郭晓峰与大钊是同乡，他们同是河北乐亭人。经郭的介绍，我们认识了。当时，大钊从日本留学回来，在北京创办《晨钟报》（即后来《晨报》之前身），继后，他又主编《甲寅日刊》。1917 年，我曾在此刊物上发表过讲“青年问题”的文章。

十月革命爆发后，马克思主义迅速传入中国，给新文化运动增添了新的内容。李大钊最早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他思想敏锐，博学多识，广泛接触社会，热情传播马克思主义，宣传俄国十月革命，发表了《庶民的胜利》的演说和《Bolshevism 的胜利》等著名文章。与此同时，他还组织演讲会，邀请名人讲演，推动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使民主和科学的口号逐步深入人心。一次，大钊以“亚细亚学会”的名义组织讲演会，我也去听了，地点在当时有名的湖南会馆。邀请的讲演者有蔡元培、陈独秀、章士钊、李石曾、张继等人。这次讲演会听众很多，整个湖南会馆都挤满了。每个人讲演的具体内容，我已经记不清了，但是大钊组织这次讲演会不久，就到北京大学任图书馆主任了。

大钊到任后，对图书馆的业务进行了一些重大的调整和改革，并开始注意收集有关马克思学说的书籍以及俄国十月革命以来的著作。是时，我在北大已经毕业，留校做助教，教预科。平时课程不太多，就在图书馆帮助大钊做些工作。我的工作室标为登录室，在主任室的旁边。其时，李大钊组织一些学生勤工俭学，课外帮助整理图书，翻译、编目、打印卡片等，我则负责检查和校对。毛泽东同志来北大时，一度也参加了这项勤工俭学活动，担任登录工作。由于工作之便，我得以时与大钊聚谈。每年北大放暑假，大钊回家乡到五峰山休假，我就代理他在图书馆

的职务。

在李大钊的领导下,图书馆成了北大校内一个研究、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中心,许多激进的学生经常到图书馆和大钊讨论各种新的思潮,听他介绍新的思想。大家也常常在此聚会,探讨中国的出路,寻找救国拯民的方法。李大钊是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北大红楼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

少年中国学会

1918年6月底,由王光祈、李大钊等发起成立少年中国学会。这是一个带学术性的进步政治团体,其宗旨是“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还有四条信约:一奋斗,二实践,三坚忍,四俭朴。学会总会设在北京,成都、南京等地还设立了分会。

少年中国学会会员很多,大多数人希望通过这个组织,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团结进步青年,从事政治斗争和群众运动。一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想通过它寻找中国的出路,但他们往往不能把握现实,陷在不切实际的空想中。邓中夏、高君宇、赵世炎、毛泽东以及杨钟健、周太玄、袁守和、朱自清等都是少年中国学会的会员,后来成了国家主义分子的李璜、左舜生、曾琦等也参加了这个组织。由于学会组织成分很复杂,内部始终存在着明显的分歧。

5

少年中国学会北京总会正式成立于1919年7月。学会出版了《少年中国》月刊和《少年世界》。《少年中国》由北京会员编辑,1至7期,由王光祈负责。从第8期起,组织了少年中国编辑部,由李大钊、康白情、张申府、孟寿椿、黄日葵5人担任编辑事宜。上海亚东图书馆办理印刷发行。

学会经常在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来今雨轩和北京大学图书馆举行常会,内容多是研究学会的日常工作、与各地分会进行交流等等。

1920年8月,天津觉悟社为了联合进步团体,采取共同行动,全体社员到北京,邀请北京的进步团体举行座谈会。少年中国学会、人道社、曙光社、青年互助团等5团体20余人参加了这次座谈。

8月16日,座谈会在北京陶然亭慈悲庵举行。觉悟社社员刘清扬主持会议并报告了开会宗旨,继由邓文淑(颖超)报告觉悟社的组织经过和一年多来的活动,接着周恩来发表演说,说明觉悟社提出联合进步团体、共谋社会改造的意义。李大钊代表少年中国学会致答词,他提出各团体有标明主

义的必要。认为近年以来,世界思潮已有显然的倾向,一个进步团体,如不标明主义,对内既不足以齐一全体之心志,对外就更不能与他人有联合的行动。我也在会上发表意见,极力赞成改造联合。会议决定,由各团体合推代表三人,再次开会讨论联络办法。

8月18日,各团体的代表在北京大学图书馆继续开会,议决定名为“改造联合”,并公推我起草“宣言”和“约章”。根据会议的决定和大家提出的意见,我草拟了《改造联合宣言》和《改造联合约章》。后经过各团体的讨论,得到正式通过。《改造联合宣言》的第一段是这样的:

我们集合在“改造”赤帜下的青年同志,认今日的人类必须基于相爱互助的精神,组织一个打破一切界限的联合。在这个联合里,各分子的生活必须是自由的、平等的、勤劳而愉快的。要想实现这种大同世界——人类大联合的生活,不可不先有自由人民按他们的职业结合的小组织作基础。我们为渴望此土的各种自由组织一个一个地实现出来,不能不奔走相告,高呼着“到民间去”!

以后《改造联合宣言》和《改造联合约章》发表在《少年中国》杂志的第2卷第5期上。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少年中国学会的内部斗争日益激烈,以致发展到不可调和的地步,最后终于公开分裂了。

离校赴法

1917年,我在北大毕业,留校三年后提为讲师,继续教逻辑和数学。在这期间,学校从教育部得到一笔经费,决定陆续资送四个教员、四个毕业生到国外学习深造。教员四人是朱家骅、陈大齐、周作人、刘半农,学生中第一人就是我。我报的学习专业是美学,学校却指定我学图书馆学。但是还没有等到学校资送,就又有了别的出国学习的机会。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法人士为沟通中法文化交流,组织了华法教育会,倡议中国学生赴法勤工俭学。蔡元培、吴稚晖、李石曾等人参加了发起和组织工作。五四运动以后,由于华法教育会的鼓吹和倡导,逐渐形成了勤工俭学运动的高潮。许多进步青年为探求彻底改造中国的真理而踊跃报名。当然有许多人是因为国内军阀长期混战,民不聊生,到欧洲去寻求生活出路的。

李石曾、吴稚晖等人在法国巴黎筹办了一所中法大学,但是很缺教

授。经别人推荐,他们找到我,我是受聘教逻辑的。其时,蔡元培先生正准备赴欧美考察教育及学术研究机关状况,遂约定与蔡同行。我用“蔡先生秘书”的名义办理了出国手续。

1920年11月下旬,我离开了母校,离开了祖国,登上了旅法教书的征途。

北大忆旧记*

冯友兰

苦
乐
年
华

8

北大 50 周年,北大哲学系推刊行论文集,以为纪念。我写这篇忆旧记,叙述我在北大哲学系当学生时候的经历,求在论文集的尾巴上占点篇幅。我想,在我与北大哲学系的关系上,这不能算是不合适,因为这些经历也就是北大哲学系的掌故。50 周年纪念,是一个说掌故的机会。

自北大成立到现在,这半世纪中间,国家经过了许多灾难。虽然如此,中国社会的各方面或各部门,是一直在进步中底。我的这一些简单底叙述,可以证明北大是一直在进步中底。这也就表示,中国的学术是一直在进步中底。

在我入北大以前,我在上海入中国公学。大学预科(略等于现在底高中)。我们的功课中,有论理学一门。在那时候,上海的学校,都讲究用英文原本教科书。不管什么教科书,教员都拿它当作英文读本教。我们的这一位讲论理学底先生,也不是例外。他选定底教科书,是耶芳斯的《逻辑初课》(Jevons, Elementary Lessons in Logic)。这本书不能算坏,可是这位先生上课时所讲底,并不是耶芳斯的逻辑学,而是耶芳斯的英文。讲到关于“判断”一章的时候,有一次他叫我站起来,问我 Judgment 这个字是如何拼的,在 g 与 m 中间是不是有 e。

这位先生讲了不久,就辞职了。于是又换了一位先生。这位先生虽然也是没有学过逻辑,可是他倒是真想讲逻辑。这样就引起了对于逻辑底兴趣。我自动地做耶芳斯的书后面底习题。有一天,有一个习题做不出来,我就到教员休息室请教。这位先生想了半天,也没有办法。他说:“等下次上课时,我告诉你。”可是他以后没有再来上课,就一去不复返了。

其实,在那个时候,实在是没有真懂得逻辑的。严几道(复)先生出了一部名学浅说,又翻译了半部密勒名学,在当时就名震全国,成为西学泰斗了,我那时候,没有学到逻辑,不过倒得了学西洋哲学的兴趣。民国四年我在中

* 原载《北京大学五十周年纪念一览》。

国公学大学预科毕业,就决心要学哲学。我们毕业时,我们的科主任李登辉先生问我们同班学生的以后计划,我说:“我要学哲学。”他说:“你想当孔夫子呀。”

在那时候,要学哲学,必须入北大。北大是那时候中国的惟一底大学。照他的规定组织,文科设中国哲学,西洋哲学,印度哲学,三个学门(即三个学系)。但事实上自民国三年起,只设有中国哲学门。据说,自民国四年度起,要添设西洋哲学门,因为已经请到了一位专门研究西洋哲学底周慕西先生担任教授。我得到这个消息,很是兴奋。即在上海报考北大文科西洋哲学门。

在那时候,一般人还以学校为变象底科举。上大学为的是得个人仕途的“出身”。“出身”以法科为宜,很少有人愿意入文科。所以北大对于愿入文科底人,特别放宽入学考试的尺度。报考法科底人,必须有大学预科毕业的文凭,报考文科,则不需要。我当时拿着大学预科毕业的资格报考文科。那位主持报考底职员,很替我可惜。他劝我万不可白牺牲我的资格。他又替我想了一个折中底办法。就是:先报考法科。如果取了以后,仍愿入文科,可以请转科。他说:“从法科转文科是一定可以准底。从文科转法科,那就非常底困难了。”

我接受了他的折中办法,报考法科,那时候北大继承清朝京师大学的余风,国文及中国史地的题目,都是考进士底殿试策问的体裁。考生都有点莫名其妙。可是我也竟然考取了。考取以后,到了北平,才知道西洋哲学门,还是不开,周慕西先生实在早已去世,当时我是很失望,不过还是请改入文科中国哲学门。周慕西先生死后,他的书约有两三书架,捐入北大图书馆。在那时候,他的这批书,也就是北大图书馆中仅有底西洋哲学书了。

我算是北大中国哲学门第二班学生。在我们以前有一班,是民国三年入学底。我们的学门,既然是中国哲学门,所以功课以中国哲学为主。主要的功课是经学,中国哲学史,诸子哲学,宋学(即宋明哲学)。

诸子哲学,第一、二班合并上课,由陈介石(黻宸)先生担任。他的浙江温州一带底土话,非常难懂,所以他上堂很少开口,当时北大承前清京师大学堂之风,教授讲究编讲义。讲义用油印印出,每次上课时,有一个听差,站在讲堂门口分发。介石先生的讲义特别多。上堂以后,一言不发,拿起粉笔就写讲义以外的议论。他的诸子哲学,是从伏羲讲起,讲了一学期,才讲到周公。有一次有个同学问:“照这样讲,什么时候可以讲完。”他回答说:“哲学无所谓讲完讲不完。若要讲完,一句就可以讲完。若要讲不完,永远讲不

完。”他的思想，本来是接近佛学及陆王一派的道学底。他的此说，很有禅宗的意味。照我们的现在底看法。他的此说的毛病，在于将哲学与哲学史混为一谈。哲学也许可以是如他所说底。但是诸子哲学这门功课是讲哲学史。无论哲学是不是如他所说的，这一段哲学史总不是一句话可以讲完底，也不是永远讲不完底。

陈介石先生的话虽不易懂，但是他的学问的渊博，态度的诚恳，我们一、二两班的学生，无形之中，受他的影响很大。我们都爱敬他。不幸他于我们入学的第二年暑假中就去世了。

我们的宋学，先是没有人讲，后来请到了一位先生。他上了几次课，发了三页讲义。在那三页中，他主张：水为万物之源。我们全班，很不满意。那时候我是班长，同班叫我向文科学长（等于现在底院长）夏锡祺先生交涉。学长说：“他的讲义有什么不妥，你们可以指出来我看，不过你们在堂上千万不可向某先生有什么表示。”我们于是写了一篇“批判”，约有十几条，交与学长。过了一天，我去见学长，他拿着我们的“批判”，抱着水烟袋，停了半天，然后说：“你们的文章很好，是你们自己写底吗？”我说：“学长不信，可以考试。”他也没有说什么。过了几天，舍监把我叫去，说：某先生如果讲得不好，你们可以当堂质问他。我说：夏学长说，不准我们对他有直接底表示。舍监说：“彼一时，此一时也。”我们得了这个暗示，第二天抱着宋元学案上课，当堂质问。那位先生果然下次就不来了，后来我们的经学教授陈石遗（衍）先生知道了，把我们大加申斥。以后我们的宋学一课，就由马夷初（叙伦）先生担任。

当我们在二年级的时候，蔡先生到校了。他到北大，先换文科学长。新学长是陈独秀先生。从此以后，文科的教授也多了。学生也多了。社会对于文科也另眼看待。学校是变象的科举的观念打破了。学生中间，开始觉得入大学的目的是研究学问，并不是为得个人仕途的“出身”。

陈独秀先生专任学长，没开功课。我也没有见他作过公开底讲演。在我们这一班中，他有一件趣事。

我们在民国七年毕业的时候，全体师生照了一张像。陈先生与梁漱溟先生坐在一起。梁先生态度恭谨，陈先生则很豪放，他的一双脚，直横伸到梁先生面前。等到相片洗出以后，我们送一张与陈先生。他一看，说：“很好，只是梁先生的脚，伸出太远一点。”我们的班长孙时哲（本文）说：“这是先生的脚。”陈先生也为之大笑。

胡适之先生到北大的时候，担任比我们低一班的中国哲学史。他的中